

论 1927 年太平洋劳动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李 闯

(中共启东市委党校 办公室, 江苏 启东 226200)

摘 要:国际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成为筹备太平洋劳动会议的前提。1927 年 5 月,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武汉召开。作为会议的举办方,中共克服重重困难,为筹备本次会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共在组织能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此次会议讨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如何联合世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帝反殖民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问题。太平洋劳动会议的召开进一步鼓舞了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客观而言,太平洋劳动会议的召开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劳动会议;意义及影响

中图分类号: D1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91(2020)2-0025-04

0 引言

五卅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重要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发生直接推动了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成为影响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近代政治局势演进的重要转折点之一。五卅运动后,国内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国共两党围绕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展开多重博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关系迅速恶化,中国革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太平洋劳动会议恰逢在中国召开。作为以声援中国革命为主旨的会议,它对中国近代工运斗争影响颇大,值得学界予以关注与研究。对于这一论题,研究者虽有涉及,但囿于史料的不足与既往研究视野的限制,其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太平洋劳动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与会的各国代表进行简单性的史实铺陈叙述,而对于会议的主办方中共在此次会议中是如何因应则显得略为薄弱。有鉴于此,笔者利用相关史料,试图对 1927 年太平洋劳动会议召开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共在其中所做的努力做进一步的史实梳理与理论探讨。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五卅运动后,中共应对复杂的国内外革命形势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这一时期国内工运斗争局势演进所呈现出的复杂面相。

1 太平洋劳动会议的筹备始末与中共的初始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加剧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疯狂掠夺。不仅如此,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还竭力进行扩军备战,似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趋势。在此背景之下,太平洋沿岸各国无产阶级与工会组织为了反对战争,支援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发起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1]208}

早在 1925 年,英、法等国的无产阶级代表曾率先筹办太平洋劳动会议,后因各国当局的干涉与破坏,会议未能成功举办。1926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提议下,赤色职工国际组织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澳大利亚和中国筹办太平洋劳动会议。此倡议一出,随即得到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会组织的纷纷响应。同年 7 月,太平洋劳动会议筹备会在澳大利亚海滨城市悉尼举行。会前,由于筹备方未与各国总工会进行有关事项的协商,加之路途遥远以及各国当局对出席此次会议的工人代表进行阻拦,仅有极少的国家代表出席,致使会议未能取得圆满成功,即草率结束。此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太平洋劳动会议举办地改为中国广州。此决议得到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完全赞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表示,愿意积极承办好太平洋劳动会议。^{[2]145}

为了避免与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时间冲突,中共随即派出代表团与赤色职工国际组织进行协调,将会议时间暂定于次年五月一日。中共为此专门设立会议的筹备处并选派委员,由当时工运领袖林育南任

收稿日期:2019-10-18

作者简介:李闯(1990—),男,江苏盱眙人,中共启东市委党校办公室助教,硕士。

筹备处秘书长,负责太平洋劳动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至于太平洋劳动会议承办地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这里面有当时赤色职工国际组织对中国的现实考量。据当时著名爱国人士王万得回忆道:“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组织考察了不久前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工人运动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工人运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希望中国工人阶级、中华全国总工会担负起联络协调东方各国工会组织,支援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重任”^[378]。这显然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所领导的工人运动所持有的积极评价。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中国政治局势骤变。广州地区国民党将领李济深又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广州城,此时,再将广州作为会议的举办地已经不合时宜。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会议的举办地由广州改为中共群众基础较好的汉口,会议时间也相对延迟二十天。

中共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局势骤变以及自建党以来第一次承办国际性工人运动会议,需要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共成立会议筹备处,负责会议具体筹备工作。在会议期间,中共还成立了会议的秘书处,作为会议联络宣传与其行动机关,由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同志具体负责并且公开发行刊物《太平洋工人》和《太平洋劳动会议公报》。在此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还专门召开记者会,向中外人士广泛宣传解释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共方面确立了参与此次会议代表团成员还有向忠发、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瞿秋白、林育南、罗哲等十五人。就代表团成员结构来看,多为工人运动领袖,对工运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其中也不乏农会负责人。向忠发曾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共五大后当选为中央委员。苏兆征也曾先后领导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运动,他在中共方面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五大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李立三在此之前,曾一度担任中央和地方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则在此之前先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群众收回英租界等斗争。林育南在此之前领导震惊中外“二七”大罢工,与刘少奇、李立三等人领导湖北工人运动。与上述六人不同的是,罗哲曾是全国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也曾一度参与五卅运动。

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也派出陈公博、彭泽民、詹大悲等人列席参加本次会议。另外,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团体也纷纷发表告同胞书,预祝太平洋劳动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的代表共有33人,代表了太平洋地区各国1450万有组织的工人。加拿大、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团也纷纷来电祝贺。可见,中共在面临复杂的国内外革命形势之下,审时度势承办太平洋劳动会议,既是声援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勇于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同时又是鼓舞国内人民继续坚信革命,为革命而奉献。

2 太平洋劳动会议的召开与中共的应对

在太平洋劳动会议召开前的三日,汉口各工会组织代表召开会议,欢迎各国代表。参加会议的有一千余人。这次会议是正式会议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中共设立会议主席团,其成员有向忠发、李立三、刘少奇等人。赤色职工国际委员会委员长罗佐夫斯基紧接着致辞:“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有觉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进攻,掀起的革命运动为世界注目。中国的革命力量集中在武汉,武汉的革命基础是工农,唯有工农联合起来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2144]他同时指出:“革命的征途会有曲折和困难,但可以克服,各国无产阶级要坚决同本国的统治阶级作斗争,以帮助中国革命的成果。”^[2145]英、美、日、爪哇等国工人代表相继致辞。

5月20日,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按照预定期限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密切东西方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殖民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开展本地区工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斗争。出席会议的共有来自中、苏、美、英、法、日、爪哇等九国代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也派代表列席、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中共代表团成员苏兆征主持。他在会议开幕词中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如能早日成功,世界各帝国主义的崩溃自在目前,故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与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其利害是分不开的。”^[2146]赤色职工国际委员会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报告。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俄国的革命相似,相信中国革命力量一定可以战胜反动势力,一定能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2146]接着,中共代表瞿秋白、刘少奇相继发言。^[4109]与此相对应的,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代表陈公博也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之后,各国代表在会上纷纷报告了本国工人运动情况。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举办期间,中共和武汉国民党政府方面都为参会的各国代表举行欢

迎宴会。中共在欢迎宴会上,毛泽东代表全国农民协会致宴会辞,他说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宴会上,已充实了口号的内在性。”^{[15]20}从毛泽东话语中可以略窥出中共在彼时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系不再停留在传统的口号层面,而是逐渐开始付诸实践。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亦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会议之后,中共还主动积极邀请英、美、法等国代表参加毛泽东所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并邀请各国工人组织代表相继发言。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也邀请太平洋劳动会议各国代表。据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在会议结束前一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由汪精卫主持欢迎会,欢迎来汉参加第二届太平洋劳动会议的与会各国代表。据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报道汪精卫在欢迎会上说道:“我们为工农痛苦与利益而革命,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如有痛苦,一定要与他们解除,有利益一定保护。”^{[16]17}与此同时,与会各国代表在欢迎宴会的演词中皆注重中国革命,要求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然后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成功是世界革命成功的一部分。此外,武汉各团体、各机关也相继召开了欢迎会。

在中共的努力之下,大会在汉口召开七天,先后通过了二十个决议案。其中,比较重要的决议案有《反对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世界各工会,对中国革命加以援助,并将帝国主义之势力逐出中国之外》《赞助中国革命事业,并祝其早日成功》《组织超越国境、种族之职工国际,以期统一全世界之劳动运动》等。大会对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职工运动,异军突起,其组织程度和斗争的坚决,比西方各国革命的势力还要进步些。”^{[14]110}同时,会议设立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作为太平洋劳动会议的常设机构,成员由各国派出代表组成。^{[17]350}在会议结束五个月之后,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下一届太平洋劳动会议将在苏联海参崴举行。中共将继续派出代表团参会,与太平洋沿岸各国继续探讨、交流工运斗争经验。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为了组织好此次会议,付出了巨大精力。尤其是中共代表团苏兆征、李立三等人,他们广泛联络各国代表,关心代表们在汉口的生活起居,认真学习和研究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促使中国更加了解世界各国革命情况,同时也让世界各国对中国革命的了解更加透彻。

3 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意义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于太平洋劳动会议召开的意义,苏兆征在筹备会的开幕词中给出五点:其一,为唤起太平洋各国的工人,一致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二,为唤起太平洋沿岸的各国工人阶级,一致来声援中国国民革命;其三,应规定工人每日的工作时间,应得工资以及其他一切改善目前生活地位的方案,反对各帝国主义者利用各种种籍、国籍以及移民政策,来离间我们的团体;其四,太平洋沿岸的各国工人阶级,应有一个组织以指挥之,使其行动一致,这个组织应在本次会议中产生;其五,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宣传帝国主义者们的暴行,唤起全世界工人阶级一致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18]7-8}可见,太平洋劳动会议的召开对于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完善会议的体制机制也起到促进作用。

此外,李立三于1927年6月12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对会议召开的原因及意义进行总结。他指出,太平洋劳动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其原因有三点:第一,各帝国主义国家,除美、日两国,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残破不堪,他们急需要到东方国家重新投资与争夺。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各国的利益冲突又将加剧,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急剧上升。第二,中国职工会成为赤色职工国际在东方最大的支部,是东方工人运动的主要骨干。第三,因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自然引起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突飞发展。^{[19]6}关于会议召开的意义,李立三认为:“这次会议产生的积极意义自然是重要的。这次会议增加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不少勇气,并指出了斗争的道路,同时也增加了更大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应该继续他的革命精神,更勇猛地往前奋斗,才能执行他的伟大使命。”^{[19]7-8}

此次会议在国内外革命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召开,具有深远而持久的意义。第一,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敢于反抗统治阶级的勇气;第二,太平洋劳动会议促进了中共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共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斗争提供宝贵的经验;第三,进一步完善会议的体制机制,为今后开展工人运动斗争搭建了交流平台;第四,这次会议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承办的第一次国际性工人运动会议,是中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

这次会议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太平洋劳动会议后,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倾向日益加剧。1927年7月15日,长期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彻底背叛革命。“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以新三民主义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大革命彻底失败。在此之后,中共迅速调整方案,清除党内右倾思想,先后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因此,笔者认为此次会议对中共革命主要产生以下三点影响:其一,中共开始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工农斗争经验并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开展武装斗争;其二,太平洋劳动会议给中共领导革命以巨大的勇气,使中共获得世界上多数无产阶级国家及其国际组织的支持;其三,太平洋劳动会议为中共领导革命指明了方向。

4 结束语

1927年4月,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关系迅速走向恶化,在此期间,由赤色职工国际主办、中共承办的太平洋劳动会议恰好在中国武汉召开。中共代表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瞿秋白等人,在会议上对资本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控诉,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太平洋劳动会议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举办,为声援中国革命,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太平洋劳动会议是中共自成立以来所承办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为中共今后领导中国革命积累了巨大财富与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1]卢权.中国工人运动领袖[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 [2]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外事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 [3]《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武汉文史资料第3辑:台湾同胞情系武汉[M].武汉:国营湖北省新生印刷厂,1997.
- [4]毛磊,毛传清.火凤凰壮歌·三次革命在湖北的一百个“最”[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
- [5]袁竞.毛泽东著作大辞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 [6]苏吉.革命叛徒的写真[J].布尔塞维克,1927(1):17.
- [7]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
- [8]苏兆征.苏兆征在太平洋劳动大会上的开幕词[N].民国日报(汉口),1927-05-27.
- [9]李立三.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意义[J].向导,1927(198):6-8.

(责任编辑:范可旭)

Discussion on Preparation and Convening of the Pacific Labor Conference in 1927

LI Chuang

(Office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Qidong Municipal Committee, Qidong 2262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 were a prerequisite for preparing for the Pacific Labor Conference. In May 1927, the Pacific Labor Conference was held in Wuhan. As the organizer of the conference, the CPC overcame numerous difficulties and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epare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PC has further improved it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The Conference discussed the issues of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how to unite with other countries' working classes in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lonial struggles and opposing imperialist interferenc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onvening of the Pacific Labor Conference further encouraged the oppressed people in the colonies and semi-colonies of the world to rise up their confidence in struggles against imperialism.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convening of the Pacific Labor Conference had positive influence and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Red Workers International; Pacific Labor Con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